

中国的 东南亚研究

成就与挑战

主 编 黄朝翰 [新加坡]

副主编 曹云华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成就与挑战

主 编 黄朝翰〔新加坡〕

副主编 曹云华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成就与挑战 / (新加坡)

黄朝翰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6

ISBN 978 - 7 - 5012 - 3155 - 3

I. 中… II. 黄… III. 东南亚—研究 IV. D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9234 号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成就与挑战

Zhongguo de Dongnanya Yanjiu: Chengjiu yu Tiaozhan

责任编辑/杨志芬

封面设计/小 月

责任出版/赵 玥

责任校对/李 琴

出版发行/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010) 65265945

邮政编码/10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京联新技术照排公司

印 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印张/850 × 1168 毫米 1/32 7¼ 印张 18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6 月第一版 200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012 - 3155 - 3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1
中国的东南亚学者：过去 30 年之初探	廖建裕/7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之演变	袁 丁/28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成就、视角与问题 ——以三家高校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为基础	张振江 /44
广东的东南亚研究	曹云华/61
广西的东南亚研究	农立夫/79
云南的东南亚研究：成就、挑战与前景展望	王士录/96
中国关于中越关系之研究.....	古小松/115
中国关于菲律宾及中菲关系之研究.....	沈红芳/133
中国关于缅甸及中缅关系之研究.....	李晨阳/154
中国关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三国的研究	王 勤/175
中国学者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研究.....	贺圣达/187
附录：学者对话.....	/206

序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曾经派康泰和朱应两人出使南海诸国（公元243~252年），两人在南海（即现在所说的东南亚）居住多年，归来后写有《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异物志》两本专著，详细地记述了南海诸国的情况，可惜这两本书已遗失，唯有部分保存于《太平通览》和《通典》等书中。

在古代，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交往中，西去东来的僧侣起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中国人对周边国家的了解和认识。例如，东晋时期的法显，在公元399年3月由长安出发到印度求法取经，他去时走的是陆路，从印度回国时走的是水路，搭乘商船途经东南亚国家，于413年回到中国。法显回国后写了游历印度的传记，名《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佛游天竺记》，该书至今仍然是了解当时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史地的珍贵资料。

唐代高僧义净，俗名张文明，于公元671年从广州取海道赴印度求法，在印度那烂陀寺学习10年，后取海路回国，又在南海一带滞留了10年，于公元695年回到中国，回国后写了《南海寄当内法传》，该书是义净根据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于当时的印度、东南亚、中国的佛教情况的实际记录。

宋代的赵汝适（1170~1231年），宋太宗的八代孙，曾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曾经担任过泉州知州，专门管理当地及南洋和阿拉伯的海路贸易，因职务之便，得以博览海外各

2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成就与挑战

国的情况，对海外诸国的历史地理有较深的认识，加上注意常与中外客商、往来使者及船工等人交往，询问有关各国之地理风土民情，从而为其写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公元1225年，赵汝适撰写了《诸蕃志》一书，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记载了东自日本、菲律宾，南至印尼各群岛国家，西达非洲之摩洛哥及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北溯中亚及小亚细亚共58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政治概况、传统风俗、风土特产、通商情况等。下卷主要记述海岛国家的物产。

古代比较系统地记述东南亚国家情况的著作还有元代周达观写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

在现代，最早开展对东南亚研究的要数暨南大学。暨南大学成立于1906年，从1927年起，暨南大学设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聚集人才，系统研究东南亚问题及华侨问题，曾出版《南洋研究》、《南洋情报》等刊物，并出版多种有关专著，还培养了一批东南亚研究人才，开创中国东南亚、华侨研究之先河。中国现代第一批东南亚研究人才多出自这里，包括温雄飞、刘士木、李长傅等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真正开展对东南亚的研究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一批高校和有关省份的社会科学院设立区域研究机构，专门对某个地区的问题进行研究。中国南方地区的五个东南亚研究所都是在60年代前后成立的。冷战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各高校和各级社科研究机构普遍设立区域研究机构，出现了区域研究的热潮，东南亚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邻居，在中国的区域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目前的中国东南亚研究有如下三大特点：

1. 从行政管辖系统看，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为高校系统，一为社会科学院系统。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

学均设有专门的东南亚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专门设立东南亚研究室，云南和广西的社会科学院均设立专门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上述两大系统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在研究重点和领域上也有不同，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主要侧重于学术的研究，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东南亚研究则将重点放在政策研究与咨询上面。

2. 从区域分布看，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中国五个最大的东南亚研究所均集中在南方地区，包括福建、广东、广西和云南。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人缘和地缘有关。从人缘的角度看，东南亚有大量的华侨华人，他们的祖籍地主要是在福建和广东，因此，广东和福建开展东南亚研究拥有许多便利，早期的东南亚研究专业人员，许多都是从东南亚回国定居工作的“归侨”。从地缘的角度看，南方几个省份均与东南亚或者是陆上相邻，或者是隔海相望，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相近。

3. 东南亚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在最近几年，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升温和东南亚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战略位置的日益凸显，涌现出许多新的东南亚机构，例如，广西大学专门成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云南也有一些大学新成立专门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对东南亚的研究不再是少数东南亚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的专利，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也对东南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非专业研究人员加入东南亚研究队伍，给传统的中国东南亚研究带来很大的冲击，他们从跨学科、交叉学科的角度研究东南亚问题，给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廖建裕先生把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划分成三代人，第一代以姚楠、李长傅、朱杰勤等人代表，他们是现代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开创者，奠基人；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包括梁志明、张玉安、陈吕范、赵和曼、陈乔之、余定邦等

人，他们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第三代则是目前仍然在岗位上的中年研究工作者，包括贺圣达、古小松、王士禄、曹云华、张锡镇、汪新生、庄国土、王勤等人，他们是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目前大多数都是相关研究所的负责人。我们非常同意廖先生的三代人的划分方法，但也需要对此作一些补充，即增加第四代人。现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学界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第四代人，他们包括庄礼伟、张振江、李晨阳、范若兰、陈艳云等人，这第四代人正在崭露头角，与前三代人相比，中国第四代东南亚研究学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充满活力，他们思维敏捷，反应快速，基本上与世界的东南亚研究站在同一个起点上。正是这第四代人，托起了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明天与希望。

从研究队伍的规模和研究成果的数量看，目前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中国正在出现一股东南亚研究热。然而，在这股热潮下面也潜伏着危机，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也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如下一些：研究人员，尤其是许多中青年研究人员不懂东南亚国家的语言，也缺乏在东南亚生活的经历；由于经费等原因的限制，大部分研究人员无法到东南亚国家去作田野调查，他们研究的依据往往只是一些报刊资料和书籍，中外记者关于东南亚的一些片面的、支离破碎的报道往往成为他们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中国目前关于东南亚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但是，高质量的成果并不多，很多成果都是重复他人的劳动，一些人甚至缺乏对东南亚的基本了解，也加入东南亚研究的队伍，也到处发表文章；由于受整个学术环境的影响，一些青年研究人员比较浮躁，急于出成果，写出来的许多东西往往有很多水分。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各地的东南亚研究机构正在采取各种对策，旨在提高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的水平和质量。据我们所知，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院、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都在开设学习东

南亚国家语言的课程，要求中青年研究人员学习和掌握 1~2 门东南亚国家的语言；这两个研究所还制定政策，鼓励中青年研究人员到东南亚国家去考察、留学、做访问学者等。

前几年，香港中文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由她做东道主，每年举行一次“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负责人联席会议暨学术研讨会”，每次会议都有一个主题，邀请中国各家东南亚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和学者参加会议，台湾的东南亚学者也经常被邀请出席会议。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联席会议举办了几年之后就停办了。2006 年 1 月 12~14 日，新加坡东亚研究所与东南亚研究所联合举办“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成就与展望”国际学术会议，中国所有东南亚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和主要学者均出席了会议，这是一次盛会，是对中国东南亚研究队伍和成果的一次检验和展示。在会上，许多学者赞扬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做了一件大好事。新加坡是东西方文化的汇合点，在这里举行有关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会议，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队伍和成果，是非常合适的。我们认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一定要走出中国和面向世界，才有出路，才有进步，在这方面，新加坡的东亚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我们将参加“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成就与展望”国际学术会议的 11 篇中文论文（廖建裕先生的英文论文被翻译成中文收集在本论文集，其余的英文论文未收集在其中）编辑出版，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透视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现状与前景，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东南亚学者的全貌。廖建裕的论文主要探讨中国三代东南亚研究学者的成长发展过程及其特点；袁丁的论文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张振江的论文对三家高校的期刊进行比较研究；曹云华、农立夫和王士录的论文主要从广东、广西和云南

6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成就与挑战

的角度探讨中国地方学者对东南亚的研究；古小松、沈红芳、李晨阳、王勤、贺圣达的论文主要探讨中国学者对东南亚某个领域或某个专题的研究状况，包括中国的越南问题研究、菲律宾问题研究、缅甸问题研究、新加坡问题研究、马来西亚问题研究、印尼问题研究以及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研究等；此外，我们还将与会学者在会议期间的讨论情况收集在附录部分，题为“学者对话”。

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正在向深度和广度拓展，中国与东南亚政治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正在加深，这些都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的活生生的素材，提供了更多的研究便利，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几代东南亚学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更上一层楼，走向新的繁荣，走向东南亚，走向全世界。

编 者

2006年8月8日

中国的东南亚学者：过去 30 年之初探

廖建裕*

相关主题的研究

中国对东南亚的历史研究始于二战以前，不过直到二战后才得以真正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意识形态挂帅，早期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之后很快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结果是，中国研究东南亚的学者（Southeast Asianists，以下称“东南亚学者”）只是出版了一些相对有意义的学术专著。1977～1978 年间邓小平复出之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始获得发展的机遇。因此，中国关于东南亚研究的机构、书籍、期刊以及论文兴起于后毛泽东时代，这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如此，专门论述中国东南亚学的著作和文章还相当有限。在笔者的印象里，王赓武教授领导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个团队在 1981 年最早进行了该领域的探讨。中国大陆的学者随后也出版了专著和文章，其中最早的恐怕要算 1984 年姚楠教授关于东南亚历史研究的文章，之后香港的黎凤慧（Frances Lai）

* 廖建裕（Leo Suryadinata）博士，现任新加坡华裔馆馆长。

在1987年编辑了一本英文论文集，在收录的论文中，一些中国学者谈到了他们所属的研究机构。后来，刘永焯在1994年出版了长篇专著，2003年刘宏也发表了一篇英文评论。但是有两篇评论文章——一篇是赵和曼教授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是梁志明、张锡镇和杨保筠在2002年联名发表的¹——应该引起特别的关注。

王赓武的报告发表在邓小平复出之后不久，文中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描绘相当悲观。但是，20年之后在由大陆学者写就的上述两篇文章中，展示了些微光明的气象，不过他们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不足之处依然持批判态度。包括这两篇文章在内，中国大陆学者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谈到了东南亚研究及这些学者所属的机构，却忽略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个人。

导致这一特点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因为东南亚研究（除了基于华人的历史研究之外）不够发达，这些学者或许没有感觉到特别突出的东南亚研究的领军人物存在。实际上，大陆关于东南亚研究的书籍要么是编撰，要么是合著，而非个人独著。这可能是因为大陆的特定历史时期，“个人主义”是不受鼓励的，任何事情都要假定是集体做的，因此应该强调研究机构而不是学者个人的工作。但是，笔者注意到这一惯例被抛弃了——1990年之后出版的大多数书籍都强调作者的大名而不是委员会或者研究机构的名称。

中国评论家没有强调东南亚学者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很难确定怎么样才算是东南亚学者。笔者认为，这一问题至少有两条判断的标准。从广义上而言，东南亚学者可以指那些研究东南亚的人，包括在不同的机构——如政府部门/机构、顾问、新闻记者——工作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不论他们的作品以及专业训练如何，只要他们的成果与东南亚问题有关，他们就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他们就是东南亚学者。另外，从狭义上来说，只

有那些致力于学术研究，并且出版了相关东南亚研究作品的研究人员和学者才是东南亚学者。在本文中，笔者采取狭义层面的定义，即东南亚学者包括语言学家、文艺评论家、历史学家、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

谁是东南亚学者？

从定义的角度来看，东南亚学者应该是领域性（area-based）而不是学科性（discipline-based）的。在某一学科中知名的学者偶尔编撰一本关于东南亚方面的书，并不能因此认为他就是东南亚学者。比如，经济学家郑学益出版了几本关于中国经济与市场营销的书籍，也编辑过一本关于东南亚华人企业的书，但在本文中并不把他作为东南亚学者。而那些出版过东南亚专著的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或国际关系专家，则可被划入东南亚学者之列。因此，在谈到东南亚学者的时候，笔者所指涉的是那些写作并出版了关于东南亚研究著作的专家和社会科学家。

探究中国的东南亚学者并非易事。受时间所限，笔者只是选择了那些出版过独著或合著（书和文章）的东南亚学者，对那些只是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期刊上发表文章，而没有独著或专著出版的个人则不在本文选择之列。这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这些人可能写过一些重要的好文章，但因时间关系，笔者没有太多时间去考察这些文章，因此无法评判他们。不过，笔者已经注意到了一些学者，他们在一些期刊上发表过文章，或者把他们承担的某书籍中的章节整理汇编成书出版。实际上，本文中列入的一些东南亚学者，他们的作品其实是论文集，而非新著。此外，笔者只讨论在近 30 年左右的时间里活跃的东南亚学者，老一辈的“东南亚学者”只有当他们在近 30 年有新著出版时才被纳入进来。比如笔者并没有把陈序经教授纳入本文来讨论，因为他关于

古代东南亚历史的作品只是从 1955 年中期到 60 年代早些时候在香港非正式出版，并且只是流传在有限的学者当中。²

在最近的一些文章中，赵和曼教授和梁志明教授等人坚持认为，在中国大陆差不多有 600 多位东南亚学者，³但除了提到这些东南亚学者在中国不同的机构里从事研究外，他们并没有给出更多的细节。不管这些学者是否出版了专著，他们也许都构成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的一员。不过，既然笔者是从狭义层面上来定义东南亚学者的，而且只有那些在过去 30 年内出版过独著或专著的研究人员才能列入其中，所以，笔者只能确定其中的 43 位东南亚学者。当然，因为笔者手头上没有中国大陆东南亚学者著作的完整目录，故本文中所列的学者名单是不全面的。鉴于此，本文只能被视为一项初步的考察。

为了更清楚的表达本人的观点，笔者将这些东南亚学者划分为三个群体：第一代（先驱，出生于 1910 年代和 1920 年代之间）、第二代（出生于 1930 年代到 1940 年代之间）和第三代（出生于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之间）。

第一代东南亚学者

第一代东南亚学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接受的大学生训练，他们最初并不从事东南亚的研究，后来才转行到该领域，可以说他们是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先驱。在本文中，笔者只选取了其中的四位学者，因为他们依然活跃在本文所涵盖的时间范畴之内，他们分别是姚楠教授、朱杰勤教授、韩振华教授和田汝康先生，前三位先生在 1990 年代先后辞逝。考察这三位学者的背景、教育和著作，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们都出生在中国大陆，并且在毛泽东时代之前就接受了大学基础教育。

姚楠毕业之后曾经在新加坡生活过七年，是新加坡中国南洋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不过在日本占领之前他已回到中国。姚楠曾

执教于多所大学（包括复旦大学），并推动了中国的东南亚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他依然积极地将一些东南亚历史方面的英文书籍翻译成中文，1984 年和 1995 年，他分别出版了两本论文集。相比之下，朱杰勤和韩振华没有海外研究的经历，他们主要研究华人的历史档案，其研究旨趣集中在中国与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交往史。朱杰勤讲授的是华侨史，并在 1992 年出版过一部相关著作。韩振华则在 1992 年出版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一书。

田汝康出生于云南，二战结束后不久，他在中国的一所大学获得学位，只有他曾经获得前往伦敦大学学习的机会。田汝康曾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云南和缅甸的掸人自治州社会结构的考察，不过他最值得关注的著作是 1953 年出版的《沙撈越华人的社会结构》，这是一部经典之作。20 世纪 80 年代，田汝康继续研究东南亚的土著少数民族，而不再研究东南亚的华人。他还是中国少数几位重量级的人类学家。

事实上，除了上述四位学者之外，梁立基教授和许友年教授也出生在 20 年代，理应归入上述类别，但因为他们都是归国华侨，而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回到祖国的，因此笔者将他们归为第二代学者。

第二代东南亚学者

第二代东南亚学者共有 21 人，除王仲廉的梁立基教授和许友年教授外，其他分别是：周南京、梁志明、王玉山、巫乐华、张锡镇、黄昆章、孔远志、林金枝、廖少廉、曾国梁、蔡仁龙、温广益、温北炎、赵和曼、陈乔之、吴凤斌、詹定邦、贺圣达。这些学者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成的大学教育，现在在中国北方或南方的一些研究机构工作。

从生平背景来看，第二代学者中有10人是海外归侨，且主

要来自印度尼西亚，另外 11 人则是土生土长的。除了陈乔之和张锡镇外——前者是经济学家，后者是国际关系学者，其他人要么是历史学出身，要么是东方语言学出身。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其他社会科学在大学里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和作品并不限于他们的专业。此外，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在中国的大学里接受的教育。

毫无疑问，北京大学是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中心之一。学者们——其中一些来自印度尼西亚——来这里学习，并且成为这个圈子的核心。梁立基、周南京、梁英明，以及后来加入的梁志明、孔远志及其他一些人是这个学术群体的核心人物。梁英明、梁志明和周南京三人合著了一本关于当代东南亚历史的教科书，并于 1994 年出版。这些人还各有其专门的研究领域，并出版有独立著述。

北京大学的周南京教授在学术界非常活跃，著作等身。在笔者看来，他最重要的成就是主编出版了一卷本的《世界华侨华人辞典》（1993 年）和十二卷本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1993 ~ 2002 年），其中百科全书的大型工程尤为引人瞩目。当然，周南京教授的同事梁英明、梁志明、何芳川，以及其他 23 位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学者也参与了这项大型工程。除此之外，他还编辑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原始资料书籍，如 1996 年的《印度尼西亚同化问题资料汇编》、1998 年的《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暴乱》、2005 年的《海外华人的公民权问题》。总体而言，周南京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从 1993 年到 2004 年他还出版过三本论文专辑。

作为最杰出的越南华人历史学家，梁志明教授享有广泛的声誉。早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就曾经到越南从事过研究。不过，他的兴趣点主要在于东南亚的殖民主义，1999 年，他领导的一个由年轻学者组成的团队出版了一部这方面的著作。

梁立基是印尼语系的创建人之一，他在北京大学培养了许多研究印尼的学者（Indonesianist）。梁立基的主要贡献在于教授印尼语言和文学，同时他还主编出版了大型的《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1989 年）。1994 年梁立基教授被马来西亚国民大学（UKM）聘为客座教授，1996 年他出版了马来文专著《光辉的历史篇章——15 世纪满刺加王朝与明朝的关系》。孔远志是上海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他可能是梁立基的学生。孔远志同样是东南亚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他翻译了许多印尼和马来亚的小说和短篇故事，参与过词典的编撰工作，并发表了大量有关印尼语言、文化和海外华侨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分别于 1992 年和 1999 年结集出版，其英文论文《论马来语中的汉语借词》获得 1988 年北京大学科学论文奖。此外，孔远志还用马来亚语和印尼语出版过两部关于郑和的著作。张玉安是孔远志的同事，他是北方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印尼研究专业，作为研究印尼民间传说的专家，他在 1999 年和 2003 年出版过几部相关著作。

张锡镇是河南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7 ~ 1988 年他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进修东南亚政治，现在其母校北京大学工作。他曾出版过两部著作——1992 年的《东南亚政治》和 1999 年的《东南亚政府与政治》。

在中国南方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也有很多研究东南亚的归侨学者，他们大多集中在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和广西大学四所高等院校。

前文提到的朱杰勤教授，作为第一代东南亚学者，他的主要学术活动地是暨南大学。朱杰勤教授帮助发展了暨南大学的海外华侨华人研究，并且主编了一系列华侨史方面的丛书。不过，笔者前文中所提到的第二代东南亚学者，如陈乔之、李学民、黄昆章、温北炎和潘亚瞰等人并不是他的学生。陈乔之主修经济，他的兴趣在于新加坡研究（1992 年），后来逐渐扩展到整个东盟地